

红军时期部队番号的演变

——人民军队番号历史沿革之一

□ 史波波

番号，是一支部队的生命和象征，凝结着历史见证和时代记忆，承载着辉煌战绩和无上荣光。人民军队的番号可以追溯至南昌起义，起义部队打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不久中央决定建立工农革命军。此后一段时间，各地涌起一系列武装起义，建立的武装叫工农革命军。1928年5月，根据中央决定工农革命军陆续改称红军。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解放战争期间，人民军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在全军范围内统一部队番号。

建军初期，红军部队的诞生、整合或撤销频繁，部队番号缺乏统一规定，甚至出现重复，如红4军就有井冈山、湘鄂西和鄂豫皖苏区3支。1930年4月，中央军委颁发《军事工作大纲》，规定各军番号和活动地区；5月，全国红军代表大会规定主要根据地红军序列与番号。自此，部队番号日渐规范。至1931年底，红军发展为拥有红一、红四方面军、10多个军约15万人的主力部队。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不久，中国革命进入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新时期。

亦称中央红军的红一方面军

红一方面军的前身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毛泽东部、南昌起义朱德一部、平江起义彭德怀部以及湘闽赣浙等地农民起义组成的地方红军。1928年4月中旬，朱德部和毛泽东部会师井冈山，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6月，工农革命军第4军改称红军第4军，又称“朱毛红军”，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红军部队。7月22日，彭德怀率部在平江起义，部队改编为红5军第13师。12月，红5军主力与红4军会师，合编为红30团。

1929年9月，红30团与湘鄂赣边境支队重编红5军。次年6月，红5军一部与鄂东南地方武装组成红8军。

要打运动战，必须有正规兵团。1930年6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4军、红6军（不久改称红3军）、红12军组成红1军团，总指挥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随后，赣西南地方武装组成的红20、红22军划归红1军团。湘鄂赣地区的红5军、红8军组成红3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湘鄂赣边地方武装组成的红16军也划归红3军团。8月，红1、红3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共3万余人，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毛泽东。

1930年11月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大规模“围剿”，歼敌约8万人。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成立，红一方面军改由其直接领导和指挥，称中央红军。12月中旬，国民党军第26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下起义，改编为红5军团，编入中央红军。

1933年2月上旬至3月下旬，中央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率领下，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央红军组建红7、红9、红8军团，苦战一年，被迫于1934年10月实行战略转移。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到达吴起镇，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11月初，陕甘支队与红15军团会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辖红1军团、红15军团。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红一方面军取得山城堡战役胜利，对于稳定陕甘宁根据地局势，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到了重要作用。

“没有蚀本”的红二方面军

红二方面军的前身主要是贺龙领

导的湘鄂西农民军、周逸群领导的洪湖地区游击队以及湘鄂赣边区的地方武装。1928年3月，贺龙在桑植创建工农革命军，后整编为红4军。1929年12月，周逸群等领导的鄂西游击总队扩编为红军中央独立师，后扩编为红6军。1930年7月，红4军（后改称红2军）、红6军会师，两军合编为红2军团。1931年3月，红2军团改编为红3军。

1933年6月，湘赣苏区的红8军、湘鄂赣苏区的红18军分别改编为红17师、红18师，合编为红6军团。湘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6军团转移湘中，于1934年10月与红3军会师。红3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红2、红6军团发起湘西攻势，至1935年1月初初建成湘鄂川黔苏区。

1935年9月，国民党军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苏区发起新的“围剿”。11月19日，红2、红6军团主力战略转移。部队经抢渡乌江、乌蒙山回旋战、巧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1936年7月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红二方面军的成立，对于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维护全党全军团结，促进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会在宁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11月，毛泽东对红二方面军部分领导说：“你们1万人，走过来还是1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艰难奋战的红四方面军

红四方面军的前身主要是鄂豫皖、鄂东南地区的农民军和游击队。1927年11月至1929年11月，我党先后领导黄（安）麻（城）、商（城）南、六（安）霍（山）起义，组成工

叶挺独立团党支部：党在军队建立的第一个支部

□ 田铭钊

叶挺独立团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正规军队。北伐战争中，独立团担任进军先锋，取得汀泗桥、贺胜桥胜利后，一路浴血战斗，所向披靡，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而享誉全国。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我们党在军队建立的第一个支部，就是叶挺独立团党支部。

在正规军队中首次建立中共支部，是党指挥枪基本原则的萌芽。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两广区委领导人周恩来和陈延年通过粉碎广州商团叛乱、两次东征陈炯明等一系列革命战争，深刻意识到掌握军队的重要性。为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中共两广区委于1924年冬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后改军事部），周恩来任军委书记。

1924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州工人组织了工团军。同年10月，在平定商团叛乱中，第二届农民讲习所200名学员组成农民自卫军。这些在大革命时期组建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是我们党所领导的非正规军。1925年11月21日，中共两广区委在得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同意后，于广东肇庆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三十四团。全团约2100余人，以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和从黄埔军校抽调一部分人员为骨干，由叶挺任团长，周士第任参谋长，建团之初即成立党支部。次年初该团改称独立团，这就是著名的叶挺独立团。党支部由中共两广区委、军委直接领导，“请示、汇报就找周恩

来同志，当周恩来不在广州时，就直接找陈延年同志”。干部调动、任免和人员补充均由中共两广区委负责。这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正规军队。

此前的1924年秋，黄埔军校成立了党的秘密组织，即中共黄埔特别支部。该支部不是党直接掌握的正规军队中的基层组织，而是最早在军校系统建立的党支部。1924年12月，中共两广区委领导人周恩来和陈延年在广州改组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建立有中共党小组，但党小组不是一级党组织。所以，叶挺独立团党支部是我们党在正规军队中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周士第曾谈到党对独立团的领导：党支部设干事会（支委会），成员有叶挺、周士第、董朗等，支部书记吴巨严。党支部初期约有20名党员，下设6个党小组，即团部一个，3个营各一个，直属队2个。叶挺独立团党支部是党指挥枪基本原则的萌芽。

独立团党支部以加强政治建设引领军队建设，是政治建军的雏形。独立团成立之初，中共两广区委就指示：加强军事政治训练，迅速培养成一支最可靠的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独立团在肇庆驻军期间进行了严格的军事政治训练。叶挺亲自给士兵上课，并要求学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士兵训练情绪很高，在肇庆的南校场、七星岩、鼎湖山到处可以看到该团官兵训练的身影。

由于中国共产党人还没有独自建立新式革命军队的经验，加上干部士

兵的来源复杂，因而各种思想在新组建的军队开始暴露。党支部及时把这些问题向中共两广区委作了汇报，区委领导给独立团下达了4点指示：一是有团结才有战斗力，必须加强党的领导，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每周开一次党小组会，要做好批评和自我批评。二是注意发展党的组织，符合条件的干部要吸收入党。三是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严禁打人骂人。四是严禁贪污，连队官兵伙食要一样。独立团党支部干事会按照这4点指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探索从政治上加强军队建设。撤销了有贪污行为的连长刘光烈的职务，开除了打骂士兵的排长薛仰宗，并对部队的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吸收了表现优秀的周子昆等一批干部战士入党，纯洁了队伍。针对报假姓名、假籍贯编写了一个政治教育提纲，教导士兵：独立团是革命军，与旧军队不同，革命军是为人民谋利益，保护人民利益的；参加革命军队就是参加革命，是最光荣的，不应该用假姓名、假籍贯；如果为革命牺牲了，其家属还会得到革命政府的抚恤。经过党、团员的努力引导，原来报假的士兵，思想有了转变，都主动填写了真实姓名和籍贯。

独立团党支部解决了政治导向问题，开创的政治工作是史无前例的。不仅教会士兵打枪，而且还告诉他们为谁而打枪，士兵觉悟有了极大提高。通过在工作、斗争中吸收连排干部和积极士兵分子加入党组织，党员人数逐步发展到120多人，独立团党的领导得以加强。

农武装，分别在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到1930年1月，上述武装分别编为红军第11军第31、第32、第33师。4月，红11军改编为红军第1军。6月，成立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12月，红15军由蕲（春）黄（梅）广（济）地区转战到鄂豫皖苏区的黄（安）麻（城）地区。

1931年1月，鄂豫皖苏区红军在群众配合下，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1月中旬，红1、红15军合编为红4军，于5月底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7月，主力南下作战。10月，在皖西组建红25军。11月7日，红4、红25军合编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

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发起4次进攻战役，歼敌6万余人，粉碎了敌第三次“围剿”的企图。红四方面军发展至4.5万人，苏区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多万。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余万兵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错误指导，红四方面军被迫于10月战略转移。1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很快解放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县绝大部分地区。1933年2月中旬，川陕苏区初步建成。7月上旬，部队进行扩编，以第10、第12、第11、第73师为基础，扩编为第4、第9、第30、第31军。经过10个月的艰苦作战，川陕苏区进一步巩固。

1935年3月28日至4月21日，红四方面军进行嘉陵江战役，歼敌1万余人，攻克8座县城，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红四方面军从1935年3月强渡嘉陵江至1936年10大会师的19个月中，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经历了极为曲折的过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先后往返雪山草地，与敌战斗千百次，在川、康、甘、青四省边境地区宣传了革命思想，播下了革命种子，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大会师。

独立团党支部加强军队作风建设，培育了铁一般作风的精神内核。独立团党支部干事会非常重视部队良好作风的形成。把一般部队的“三操两讲”制度改为“四操三讲”（“四操”：早晨一次早操，上、下午各一次军事操练，黄昏一次军事体操。“三讲”：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列队点名讲评），强化军事训练。除此之外，还经常把部队拉到七星岩聚星桥、含珠径等险要之地进行山地攻防演练，培养官兵坚韧的品格和出色的作战技能。

肇庆为粤西咽喉之地，商贾云集，部队驻在闹市区，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对官兵有所浸染。为杜绝官兵不检点的行为，叶挺组织了一支军警督察队，自己兼任队长，对不管是不是本团官兵的军纪问题，还是友军的走私谋利、敲诈勒索和欺压群众等不法行为，一律严加追究。通过剔除封建雇佣军队的陋习，严明了军纪，密切了军民关系，奠定了独立团铁一般作风的基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邓演存曾总结独立团作战取胜的原因：“由于该团的成员，主要是共产党员为骨干，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和坚强战斗意志，执行革命军‘不拉夫、不筹响、公平交易’的严明纪律，因而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叶挺独立团党支部作为党在正规军队中的第一个支部，有效确保了独立团成为我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作了有益的探索。



李贞是新中国首次授衔的将师中唯一的女性，她和丈夫甘泗淇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将军夫妻。李贞18岁投身革命，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加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光辉的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是党给了我信心和力量”

李贞于1908年出生在湖南浏阳一户贫苦家庭。6岁那年，她被送给正在四处收养女儿的地主家庭。未承想，地主家明面上收养女儿，实则将李贞当作童养媳，背地里更是将其作为丫鬟使唤。李贞的童年在包揽脏活苦活累活和忍受拳打脚踢中悲惨度过。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李贞坚韧不拔、胆识初显，与其他女伴密谋计划逃离婆家，进城做工。不幸的是，李贞的谋划很快被地主家人察觉，为防止她逃走，立即严加看守并迅速为其举行旧式婚礼。婚后夫妻感情并不融洽，李贞不堪忍受屈辱和折磨，决心通过抗争摆脱地主的束缚和禁锢。

1926年，农民革命运动在湖南各地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李贞偶然得知共产党来到了她所在地区，就不顾一切地抓住机会，剪掉辮子，决意“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在邻居的帮助下参加妇女协会，在登记姓名时，李贞将自己“旦娃子”的名字改作具有忠诚不变和美好梦想双重含义的“李贞”。因其踏实能干、胆大心细，不久后成为乡妇女协会委员长。担心被李贞连累的地主家起先限制她的人身自由，后来直接一纸休书将她送回娘家。李贞如愿重获自由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她回忆这段经历时多次说道：“是党给了我信心和力量。”

“不能让敌人抓活的，往下跳！”

土地革命时期，李贞加入浏阳游击队，参加过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湘赣和湘鄂川黔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同敌人进行过多次战斗。

在浏东游击队期间，李贞曾经历过一次“狼牙山五壮士”式的壮举。1929年寒冬，李贞所在的游击队遭遇敌人“围剿”，被封堵于一个叫十八折的地方。游击队夜以继日奋力激战，弹药耗尽时，用石头充当武器顽强还击；体力不支时，用树皮野果充饥。面对敌人叫嚣“抓活的！抓活的！”担任士兵委员会委员长的李贞毫不胆怯，带领大家端起刺刀冲向敌人。尽管他们拼尽全力殊死搏斗，但仍寡不敌众，仅剩的六七个人很快被逼到狮子崖，眼看将被敌人活捉。在这危急关头，李贞果断发出命令：“不能让敌人抓活的，往下跳！”话音刚落，她两眼一闭，不顾自己几个月的身孕，纵身跳下悬崖。紧接着其他游击队员也跟着跳了下去。李贞苏醒后，发现自己被卡在树枝上，不远处还躺着2名已牺牲的队员。她浑身疼痛难忍，鲜血顺着腿流到脚面，意识到自己流产了。她顾不得战友牺牲和孩子夭折的悲伤，咬紧牙关协同幸存的伙伴掩埋好战友的遗体，相互搀扶着摆脱了敌人的包围。后来，长期频繁激烈的作战行动使得李贞无法休息调养。长征途中，李贞的孩子由于早产后缺乏营养而夭折，从此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造成终生遗憾。

“同志们，腿不能软，坚持就是胜利！”

1935年11月初，红2、红6军团在摆脱敌军围追堵截后，从湖南省桑植县出发，日夜兼程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初期，为照顾担任红6军团组织部长的李贞，相关部门给她配备了一名勤务兵、一匹马和一项帐篷。李贞婉拒了勤务兵，将帐篷与其他女干部同住。而马作为当时的稀缺物资，李贞一次都舍不得骑，后来直接送给救护队驮运伤病员。在行军途中，李贞搀扶腿部受伤的战士艰难行走，恰巧被军团长萧克看见，便询问李贞为何不骑马。身边的警卫员作答：马送给伤病员骑了。

1936年春，红2、红6军团抢渡金沙江后，向玉龙雪山挺进，翻越这座海拔近5600米的雪山要比打一场

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李贞

□ 李海龙 王冰

恶仗更难。脚下是冻土，前方是深不可测的厚厚积雪，身边则是刀削斧劈般的冰川，有些战士在极度疲倦中跌落山谷。李贞将红旗插在山顶，站在队伍中间给战士们鼓气：“同志们，腿不能软，坚持就是胜利！”红2、红6军团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克服种种困难，征服玉龙雪山，又翻过几座人迹罕至、荒无人烟的大山。

当部队进入草地时，李贞在检查完战士宿营地后突然晕倒在地，经检查患的是伤寒。当时条件艰苦、药品紧缺。身为战友兼丈夫的甘泗淇担心她无法跟部队行军打仗，劝她留在哈达铺休养。李贞坚决不同意，要求用一条长布带子将自己绑在马背上，跟随红二方面军继续前行。就这样，李贞被紧紧绑在马背上，睡醒醒醒、起起伏伏，跟着她生死相依的战友们在艰难地朝着甘南方向前行，最终顺利到达陕北。

“我们不能贪图享受，丢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1955年9月27日，在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次授衔典礼中，李贞、甘泗淇夫妻二人分别被授予少将、上将军衔。虽然身居高位、功名赫赫，但李贞仍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李贞时常对身边的人说：“战争年代十分艰苦，现在条件好了，我们不能贪图享受，丢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

1980年，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李贞的级别定在大军区副职。但她仍住在香山脚下年久失修、基础设施落后的普通四合院里。这个房子夏天漏雨、冬天漏风，特别是冬天格外难熬。每逢冬季，李贞便穿上又笨又重的帆布羊毛大头鞋和打满补丁的棉大衣，膝盖上放着热水袋，在上漏下湿的屋子里看书、批阅文件、处理群众来信。亲朋好友们来看望她，觉得住这种房间与她的身份不相符，显得太寒酸。可李贞却认为，跟以前相比，有这样的房子住就不错了，而且置身于群众之中，就不会脱离群众了。这期间，深感“活着就很幸福”的李贞谢绝了春节前总政领导给的拜年钱，屡次拒绝组织上劝其搬家的心意，多次婉拒组织上给予的特殊照顾。就这样，两个普通书柜、一张办公桌、几把沙发椅、一个衣柜、一个落地衣架、一张大床，在被反复修补下陪伴李贞度过晚年时光。1990年3月11日，参加革命64载的女将军李贞走完82年的光辉人生。在生命的最后，她将自己寥寥可数的遗物，几乎全部捐送给了自己的家乡以及她一生拥护热爱的党和国家。